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文革對世界的衝擊 II

### 世界資本主義視野下的 兩個文化革命

● 德利克  
(Arif Dirlik)

重新恢復文革的歷史事件地位，不但是為了讓我們以一種批判的態度正視它，也許更重要的是要恢復我們的批判自覺，好讓我們亦能以批判的態度正視那些因為抹掉革命歷史而被束之高閣的現代問題。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世界性歷史事件。這樣形容它並不表示我們無視它在中國造成的許多慘劇，原有它的荒唐暴行，或者全盤(或部分)接受它的經濟、政治或文化政策。所謂世界性的歷史事件，其定義幾乎必然是指造成創傷的事件，其後果難以作非黑即白的評斷，也未必能實現發動它的初衷，但卻無可避免地把那些阻礙這股改變歷史走向巨潮的人輾得粉碎。然而，我們必須把文革視為其歷史環境中一些根深蒂固問題的表現，這個歷史環境不獨關乎中國當年的歷史環境，還涉及與國內問題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國際環境。我們不要忘記，在那些歷史環境中，世界各地人民迫切為這些問題尋找解決方法，他們對於文革燃起的希望深感共鳴。

說文革是世界性的歷史事件或許並不新鮮。文革自開始直至1970年代末被中國官方否定之前，已被各方視為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重大事件之一。然而，自此以後(特別是在過去十年)，文革(乃至整個中國革命)不斷被抹黑，這段歷史被貶為自相殘殺的事件，或黨領導人的風流帳，特別是毛澤東，他的形象由原來的革命導師淪為色欲狂。這樣重寫歷史不但沒有以批判態度正視文革提出的問題，反而企圖以大事化小和道德譴責的手法抹掉對這場歷史事件的記憶。(大家或已注意到，這正是文革中人們把對手從歷史中剔除的一貫手法。)或許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我們身處的這個年代正在試圖忘卻兩個世紀的革命史，不獨中國如此，全球皆然。政治風氣右轉是革命史被抹掉的原因，中國的情況更有固執的東方主義在推波助瀾。東方主義不承認中國社會是真正變動不居的，反而固守一種落後的文化心態，不斷尋找證據支持在它眼中各種僵化的中國形象。像東方主義展現出的那種缺乏歷史的社會，顯然無法產生世界性歷史事

件。正因為出現這種歷史被抹殺的情況，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復文革的歷史事件地位，這不但是為了讓我們以一種批判的態度正視它，也許更重要的是要恢復我們的批判自覺，好讓我們亦能以批判的態度正視那些因為抹掉革命歷史而被束之高閣的現代問題。

以下的討論，將集中在三個足以證明文革有資格成為首要歷史事件的層面上：(1) 作為共產革命史的一個新出發點；(2) 各新興國家紛紛獨立後，作為第三世界社會主義的表現；(3) 作為挑戰公認的資本主義和蘇式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發展規範而提出的社會思想。這些特點正是文革在進行的二十年(1956-1976)裏，深受各地人民支持的原因。我不打算在此論述文革對中國國內造成的影響，因這方面我已有另文討論<sup>①</sup>。但我要提出一點：文革作為世界歷史大事所帶來的衝擊，是與人們如何評價它對國內的影響有關的——這種看法和從前擁護文革、現在轉而伐之的人的主張相反。當文革被視為影響世界的事件時，人們比較不注意它的不良後果。反之，現在這些不良後果被大肆渲染，或許不是因為出現了甚麼新證明，而是因為文革從歷史事件的位置滑落，遂令它的陰暗面浮上檯面來。這點稍後再論。

## 文化大革命對世界有何意義？

文革是共產革命史上的首要大事。「文化革命」一詞經過中國這一場變動而為人熟悉後，也可以套用在其他共產革命事件上，最顯著的例子莫如1920年代末的蘇聯<sup>②</sup>。這個詞和它所帶來的渴望包含着崇高的意義：如果社會主義代表一種新的生產模式，它就有兩重明顯的涵義：(1) 新生產模式將產生有助它達成目標的新文化；(2) 革命領導層應致力創造這種新文化，以鞏固新的生產關係。就上述兩點來說，文革在邏輯上是緊隨着馬克思主義的前提的：文化生活和生存的物質條件之間有着必然關係。新人類是新生產模式不可或缺的。

自文革以後，「文化革命」一詞的涵蓋面已從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擴展至普遍的革命轉化經驗——超越了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即把革命轉化等同於由某一生產模式演變至另一生產模式。因此，「文化革命」被用作描述單一(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內部演變所相應產生的文化轉變<sup>③</sup>、伴隨着現代民族國家興起而產生的轉變<sup>④</sup>、以及對於日常語言的態度的轉變<sup>⑤</sup>。換言之，文化革命的理念除了指涉特定的社會主義轉變問題外，也開展了透視文化轉變的新路向。

「文化革命」涵蓋面擴大，或許證明了文革對知識界(甚至包括那些不再把這詞彙視作歷史事件的人)的影響，不過，回溯這個詞在當時歷史環境的具體意義仍是很重要的。文革凸顯了社會主義革命中三個需要確切說明的重要問題。第一，它挑戰社會主義革命(和一般革命)在制度化後不免「非激進化」這一公認的想法。這種想法源自蘇聯(特別是史大林主義)的早期經驗，指出一旦參與革命的一代凋零後，革命便會淪為例行公事和官僚作風，從而喪失其對抗權力迫切

自文革以後，「文化革命」一詞的涵蓋面已從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擴展至普遍的革命轉化經驗，即把革命轉化等同於由某一生產模式演變至另一生產模式。換言之，文化革命的理念除了指涉特定的社會主義轉變問題外，也開展了透視文化轉變的新路向。

所需的烏托邦理想<sup>⑥</sup>。當年文革正是駁斥這種思想的運動。這點不能和早期(如1920年代蘇聯)為社會主義創造合適新文化的做法混為一談。雖然它和蘇聯的先例有着共同目標,但文革創造新文化所持的理想,在於竭力阻止革命「非激進化」<sup>⑦</sup>。

第二,文革期間這一關注達到高峰,因為文革是對抗原來革命的另一場革命,這大大幫助了中國向全世界推廣她的社會主義模式,用以抗衡原來的蘇式社會主義,為世人渴望以民主社會主義來對抗獨裁社會主義提供答案。文革試圖為新社會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它運用的方法空前激烈,因為塑造新人的目的,是要對付新政權本身顛覆的官僚主義。文革以打倒舊文化為目標,但卻以質疑共產黨官僚體制的新「革命」文化為手段。由此看來,它的目標是真正革命性的,不只直接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政體,也對抗社會主義統治集團。在各地人民厭惡官僚化的情況下,這目標獲得各方回響,官僚化的特色似乎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表現中得到現代性。文革的反官僚主義和反精英主義,是促使新共產主義運動出現的重要因素,而新共產主義運動的目的是要擺脫早期共產主義的政治模式<sup>⑧</sup>。

文革創造新文化所持的理想,在於竭力阻止革命「非激進化」。文革以打倒舊文化為目標,但卻以質疑共產黨官僚體制的新「革命」文化為手段。這目標獲得各方回響,官僚化的特色似乎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表現中得到現代性。

最後,文革把馬克思主義中關於文化與新生產模式(以及擴展至政治和生產模式)關係的新概念凸顯出來。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假定新生產模式和新文化之間存在關連,但語焉不詳,比如,到底是新生產模式創造新文化,還是文化領域中的獨立性(autonomy)造就新生產模式。由於共產黨內激進派(由毛澤東領導)不滿1956年建立的新生產關係的文化影響不彰,遂決意把革命向前推進,他們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決定把新一輪的革命活動鎖定在文化領域。在此過程中,文化領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獨立程度(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用語),以使文化能夠承擔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重任。在這情況下,文化中被認可的獨立性不管是來自中國固有歷史遺產、以意識形態鬥爭為主導的游擊戰革命遺產、或是處理社會主義革命後果的理論(亦是此理論賦予社會主義革命合法性)的必然結果(換言之,社會關係的物質轉化無法自動產生新文化),都無關宏旨。結果很清楚:形成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角是文化轉化,而不是社會主義轉化的作用。這種文化獨立性和經濟或社會獨立性的對抗,和1960年代全球發生的蛻變相共鳴,這點以下會再論述。在此只需說:與從經濟或技術角度理解的生產模式的機械式轉化相逆,它極為強調革命的政治和思想層面的重要性,這導出一種異於以往現代化假設(包括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新的行動方向。

如果光以文革和共產革命史的關係,並因此從第一和第二世界的鬥爭這種二次大戰後的社會學觀點來觀照文革,那是不足夠的,因為或許是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中(即使在共產革命勝利後)的曖昧地位,賦予文革具體歷史特質的。若以其社會主義革命史來看,她屬於第二世界;但若以其與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來看,她卻又處於第三世界。有一點必須謹記,文革和第三世界獨立是同時出現的,而在1970年代毛澤東受地緣政治啟發而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之前,文革和殖民地世界在意識形態上是相一致的,兩者都以

對抗歐美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式「社會帝國主義」為其根本。我認為農村式第三世界和都會式第一、二世界對比，無論對文革社會主義的新出發，或對其革命進程的思想主張都相當重要。

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必須被看為文革的重要文獻之一（尤其是今天看來它似已不合時宜），因為它具體表現出新興國家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敵意和對社會主義世界的熱望，並和民族解放鬥爭（這到目前為止以中國最成功）思想相呼應。但它是否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或革命論點（此為其理論基礎）中找到思想依據並不重要，儘管它衍伸出有關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首見於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推論是尚可商榷的；重要的是，林彪把中國革命（以農村奪取城市）的範式套用到世界各國上，並突出這種革命經驗的基本意義：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對抗，是國際要關注的首要事項。它透露的訊息意味深長：在解決世界問題之前，必須先解決農業社會問題；正如要解決某一國（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問題前，先要解決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經濟問題。但這訊息卻不幸被文章的敵意蓋過了<sup>⑨</sup>。

在此提出這篇文章的意義，並不是因為它向工業社會宣戰，亦不是它對農業社會的強調，而是它表達出第三世界社會在非殖民化過程中而得的授權（empowerment）意識。這一授權意識在各色各樣的發展意見被提出時顯而易見，卻難在資本主義或蘇式社會主義發展策略中找得到。毛主義的發展範式也許是各種發展概念中最強有力的，它在新民族解放鬥爭中為新政權尋求振興經濟力量時顯著地表現出來。這種範式提出：（1）發展策略需以國家全面發展為出發點。（2）要實現前一點，就必須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delinking）。

第一個前提早見於毛澤東在1956年發表的〈論十大關係〉，文章呼籲要注意全國「發展不平衡」造成的矛盾。第二個前提則在文革年代強調自力更生、避免在物質或思想上依賴外國時已清楚表明。其分析假設是根據第一個前提的邏輯，它指出如果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將不免以此世界體系的經濟需求為依歸，而忽視國內的經濟需求。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毛主義」前提與中國革命淵源深厚。關於國內經濟捲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果，早在1920年代已為當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密切關注<sup>⑩</sup>。這些前提在1960年代再度被提出，對第三世界發展思想影響深遠，在這方面，著名發展經濟學家亞敏（Samir Amin）的著述可謂其典範<sup>⑪</sup>。

這個新發展範式除了結構上的意義外，最後還提出隱含深邃社會意義的實質問題，這與當前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社會的關注相呼應。像自力更生這種毛主義發展思想中心的口號，不但指出要避免依賴外援，也呼籲人民積極參與發展過程。這含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在早期發展（資本主義或蘇聯式社會主義）概念中群眾被邊緣化，針對這一情況，在自力更生的概念中，「人民」既是發展的驅動力，也是發展的目標。按此路線構思的發展，不再由專家當家作主，而是以「人民」為發展過程的核心。要落實這套過程，必須把集體價值置於私人價值之上，因為合作和日常協商對達致社會目標是攸關重大的。政治

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必須被看為文革的重要文獻之一，因為它表現出新興國家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敵意和民族解放鬥爭思想，並套用中國以農村奪取城市的革命範式，突出這種革命經驗的基本意義：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對抗，是國際要關注的首要事項。

上，這過程需要以日常原則來參與集體決策，為草根階層通過民主方式參與社會生活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契機。勞動人民(即大多數人)亦要負責管理他們的生產活動。堅持自力更生所依據的基本前提，是承認人民主體性和他們能夠按照社會目標來管理自己的主體性。

「以政治為綱」(putting politics in command)這一自力更生的狀況，意味公共價值優先於私人價值。能夠絕對做到公優先於私的人，必須能從內心克服會導致個人主義的社會差別，不管是階級和性別差別、勞動差別、專家和非專家的等級差別、以至最基本的腦力和體力勞動差別。要塑造這樣的人一方面要有恰當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由於社會轉化和文化轉化間存在對立，所以個人也必須致力達到文化上的自我轉化。因此，我們需要促進人民福利的社會機構，並確保人民忠於集體機構，但這又需要獻身於恪守承諾而不會佔這種機構便宜的人。最後的一種需要，不但解釋了發起「文化革命」的原因，也解釋了文革教育政策的方向。

想要達到美滿生活必須有適當的學習和教育方式，雖然文革教育政策未能落實這個社會構想，但這些政策卻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為毛後時代政策的成功作出貢獻；即以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塑造有才幹的民眾，解決地方問題並參與地方發展。

文革結束後，這些政策在國內外均受到批評。對於文革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評自然有其道理，但批評時必須慎重思考所持的論據。我認為最不相干的論據是認為文革妨礙促進現代化的教育，說它不相干不是因為它不正確，而是因為它評斷文革政策所持的標準本身就是文革批評的對象。文革為了抗衡「世界銀行」式教育(或為了成就資本主義經濟世界的教育)，提出自己的一套教育理想，以幫助建設它憧憬的美滿社會。如果要指責這一種教育理想，不可能不先指責貫穿其中的社會理想，這當然與矛頭指向文革的批評大大有關。若要以一種較不涉及意識形態成分的進路來研究這問題，則會使我們以違背文革的前提來判斷其教育政策，這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文革提出的一個問題，即想要達到美滿生活必須有適當的學習和教育方式(兩者是密不可分的)，這可能為人們所忽略。

另一方面，專制的政治和文化環境把它模糊的(和庸俗的)社群和文化概念強加在社會上，在這種情況下，文革倡導的社群教育政策能否貫徹是另一回事。我想，這是普見於文革政策中的一種基本結構矛盾。不過，值得深思的是，雖然文革教育政策未能落實它們背後的社會構想，但卻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為毛後時代政策的成功作出貢獻；即以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塑造有才幹的民眾，解決地方問題並參與地方發展(這和大多數第三世界社會自上而下的文化處境大相逕庭，在第三世界，地方社會依賴集權中央的指導，而這些指導趨向迎合國際需要，而不是着眼於近在咫尺的內陸需求)。

在此，我要強調毛主義制度構想中一個受到經濟效益觀點批評、卻對社會和政治組織仍然影響深遠的層面，那就是堅持農業和工業結合，為的是要克服農業和工業(或鄉村和城市社會)間的結構分歧，這種分歧似乎是現代社會的特質。這是1958年慘痛的大躍進的制度改革之一，然而，一如毛主義發展思想的其他層面，其根源繫於中國革命史。雖然共產黨人尋求這種結合，是出於延安革命年代的需要，當時他們別無選擇，不得不實行自給自足，但這種構想最早

出現於二十世紀最初十年，無政府主義著述中鼓吹的中國激進思想(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著述的啟發)裏。必須注意的是，在無政府主義著述中，工農業結合建立自給自足地方社群這一概念，和塑造全能(兼可勝任腦力和體力勞動，藉以消除勞動分工造成的階級分歧)同出一轍。不用說，對於拒斥民族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來說，首要目標是要避免在重新肯定社群的價值時出現現代工業社會的異化現象。當它被納入毛主義的發展思想裏，這些無政府主義理想也就和民族自治和發展的策略聯繫在一起<sup>⑫</sup>。

即使是這樣，無政府主義者把國家和社群對比，可能會告訴我們有關毛主義對社會的概念和它們所包含的矛盾。自力更生(這些制度革新可視為其體現)是一有多重意義的理念。它的目標不但是要藉着自力更生來達到民族自治，還要做到社會各層面(下至地方)均能自治(這點在強調「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的經濟學觀點來看是堪以為憂的)，以使地方社會自力更生，無須依賴外援，文革時代以山西大寨的成就為表表者。然而黨官僚集團大權在握，可依照它眼中的政治、經濟和民族利益來調度資源，這就和自治社群的構想相抵牾。自力更生不但是一種達致民族經濟自治的手段，也是建立社群的方法。它的烏托邦理想，吸引了那些本來對中國民族主義缺乏興趣的人。

所有這些承諾都有缺陷，特別是在權力不平等的情況下，文革最終不僅沒有將之消除，反而使之惡化，但這不是本文要處理的事情，我在此更關心的是這些毛主義思想對世界各地人民有甚麼吸引力<sup>⑬</sup>。文革毛主義提出的發展範式不但解決了新興後殖民社會既要發展經濟又要兼顧凝聚社會的窘境，它似乎還解決了經濟進步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在發展中遇到的異化問題。無怪乎文革產生了一套關於發展的新激進理論，這套理論為了落實參與發展和民主管理的理念，不惜犧牲經濟效益<sup>⑭</sup>。因此，我們毋須驚訝文革為何能吸引那些原來沒甚麼理由會認同其革命目標的人，吸引那些從文革的社會成就中看到促進社會凝聚的新方式及落實社會目標的承諾的保守派。

毛主義制度構想中堅持農業和工業結合，為的是要克服農業和工業間的結構分歧。這種構想最早出現於二十世紀初中國無政府主義著述中鼓吹的激進思想裏。當它被納入毛主義中，這些無政府主義理想也就和民族自治和發展的策略聯繫在一起。

## 當代視野中的文革

在我提出以歷史角度評價文革的當代框架之前，先要釐清我對文革的概念。若根據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中國官方對文革的時間劃分是一歷時三年(1966-1969)的事件；若按照毛後政權的官方觀點，卻是「十年動亂」(1966-1976)；我把文革理解為一歷史事件所採納的材料，則超越官方所劃分的時間範圍。這甚至可能提示出我在指向文革發展政策的革命根源，把文革變為整個中國革命的具體表現，這其實就是文革本身的主張。也許特別在後者上能看出，我賦予文革的歷史意義不過是重複文革以往的主張而已。

我曾在另文解釋過為甚麼我認為以1956至1976這二十年為期來觀照文革才算恰當<sup>⑮</sup>，因此我不再贅言，僅想指出這種分期法旨在指出文革有其歷史脈絡，

或者說1966-1969或1966-1976年間發生的種種事情，早在1956年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後浮現的問題中已有迹可尋。但我認為文革最淋漓盡致地闡明了這些問題，並在全球凸顯它們。正是透過文革對這些問題的闡明，毛主席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發揮遍及世界的影響力。

關於文革和整個中國革命間的關係也可作如是觀。與文革派的主張相反，文革並非中國革命的極致表現，不是革命產生的唯一革命選擇。在革命視野中，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有不止一個毛主席，而且文革宣揚的某些毛主席的意向，和中國革命初期同屬毛澤東政策的其他意向相頡頏<sup>⑩</sup>。對毛澤東的接班人來說，文革顯然違反了中國革命的初衷。

然而，從它倡導的政策中，文革表達出和中國革命史同樣悠久的主題，有的甚至超越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本源。而文革之所以成為世界歷史事件，是因為它以闡述這些主題來獲得其意義和獨一無二的特質，這點有商榷的餘地。若失去了這些賦予它合理性的中國革命根源，文革充其量只是共產黨領導層的權力鬥爭或統治者的過失。這也許說明了為甚麼毛後時代領導層試圖把文革和革命史截然分開，因為他們要在否定文革的同時，維護中國革命的合法性。相反，這亦是海內外中國反對派企圖把文革和整個中國革命掛鉤的原因，他們不但要質疑文革，並希望藉此動搖整個中國革命的合法性。

我想在此指出，若要對文革進行真正具批判性的評價，就必須認識它的歷史真實性，即認識它在當時歷史環境下的意義，以及它隨着這些歷史環境變遷而變成一樁遙不可及的歷史事件，只剩下各種惡行和壓迫的記憶。但要批判地理解文革，毋需把對當代人有有意義的記憶都抹掉。事實上，這樣做不但妨礙了批判地理解文革的需要，也妨礙了批判理解過去和現在對於思考它的方法。對於文革蒙難者來說，要求他們以批判的態度思考它是太強人所難，但這只是當代人要完全貶低它的記憶的部分原因。在道德或政治層面譴責文革的大不乏人，過去二十年來他們沆瀣一氣，當中有曾參與文革、無論在思想和罪行上都脫不了關係的中國人、忘掉了自己曾經多麼醉心文革的外國人，還有許多人把這歷史弄得俗耐不堪，以作為風行世界市場的商品。意識形態和消費式揭秘心態的詭異結合，使得任何對這事件稍有見識的論述均欲說無從，遑論有批判的見識的著述。

我不想在此分析過去二十年關於文革文獻的轉變(不管它如何重要)，只想提出一個問題，為甚麼二十年之前曾被激進派、保守派都視為革命(和發展)成就範式、為之喝采的文革，現在竟受到如此指責和貶斥，無法為當代提供啟示？我故意給這問題以抽象和思辨性的答案，盼能拋磚引玉，激發更多有關歷史記憶的討論，但這答案也作出承諾，把有關中國革命的批評從現今遭知識界貶斥而湮沒的境況中挽救出來。

今天文革似乎已無關重要，那是因為它針對的問題已無甚意義。這點在前文論述它關注的首兩件事情中顯而易見。當年文革出現的意義重大，它對抗無可避免的「非激進化過程」，這是社會主義革命(或一般革命)史上的突破。當今

毛後時代領導層試圖把文革和革命史截然分開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要在否定文革的同時，亦要維護中國革命的合法性。相反，這亦是海內外中國反對派企圖把文革和整個中國革命掛鉤的原因，他們不但要質疑文革，並希望藉此動搖整個中國革命的合法性。

天社會主義和整個革命政治理念都被丟到過去，革命政治的突破就變得不着邊際，更遑論其歷史意義。關於文革作為第三世界政治復興的體現也大抵相同。在1960年代文革的歷史環境中，第三世界理念在國際政治話語中舉足輕重。今天，第三世界已談不上是一完整理念，更不用說是甚麼承諾，提出以革命的第三世界方案替代公認的發展範式已無可取之處<sup>⑩</sup>。第三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正急於為自己披上第一世界的外衣(與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政權的主張相反，現在已沒有第二世界可言了)；尚未進入發展中經濟國家之林的第三世界社會，現已弄得烏煙瘴氣，顯然不靠外國援助就難以求存。

上述轉變並非意識形態方面的轉變，而是國際關係轉變的結果。我曾在另文說過，我們所知的整部社會主義史，無非是第三世界史，必須透過它們與資本主義內在演變的關係來理解<sup>⑪</sup>。殖民主義(以及針對它而出現的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其中一個階段的產物(尤其在第三世界)。雖然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模式仍然屹立不倒，但當代資本主義所追求的世界關係，已跟從前產生第三世界或試圖牽制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迥然不同。資本主義這一新階段(管它叫世界資本主義、晚近資本主義、後福特主義、彈性生產或積累)的出現，使早期世界關係的概念和由此得出的剝削和壓迫關係變得與現實脫節。或許歐美跨國企業仍然主宰世界經濟，但他們當中加入了原屬於第三世界的新成員。或許宰制世界的大國仍然存在，但當民族國家的許多勢力(包括人員和文化上)已被跨國企業所取代，如今再大談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已不比以往能那麼理直氣壯了。而在此中最重要的是，以往着眼於國內市場的發展範式，已被重視出口、發展跨國經濟的範式所取代，侈談民族經濟自治已無甚意義。以前與資本的經濟運作密不可分的民族國家，現在卻被視為這種運作的障礙而受到抨擊。資本仍然主宰一切，但已被置於一個不同的系統下，這系統追求包容而非排斥。

這些資本主義內的結構演變將產生它們自己的「文化革命」，這就是本文題為「兩個文革」的原因。傑姆遜(Fredric Jameson)和哈維(David Harvey)等理論家最先指出，資本主義的新階段要求和生產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可以信手拈來以「後現代主義」一詞概括之<sup>⑫</sup>。這是另一場文化革命——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正巧和中國文革同時發生，儘管當時沒有人注意到它的恆久意義。現在來做個事後諸葛亮，回首前事倒也饒有趣味。正值文革爆發、高唱其發展政策之際，台灣和南韓分別在高雄和馬山設立出口區。或許當年批評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激進派沒有想到，擁有發展前景的是後者而非前者。但事實卻是如此。而且在這些以出口區為代表的出口型經濟體系蓬勃發展之前，提倡經濟發展的民族自治的呼聲已銷聲匿迹。不消說，這些經濟特區之所以成功，歸根究柢是仰賴日新月異的科技，使生產活動得以跨國進行。也正是這些科技使資本主義中的新文化革命得以成功，其核心是它選擇充當影像和資訊生產者，而非商品生產者(商品仍需要生產，不過是在第三世界地區，第一世界則擔任設計世界的「智囊團」)。資本主義「文化革命」在思想層面生產的正是文化本身，而不是以生產文化為手段來達到其他目的，比如社群。

我想指出，對於文革蒙難者來說，要求他們以批判的態度思考它是太強人所難；在道德或政治層面譴責文革的大不乏人，當中有無論在思想和罪行上都脫不了關係的中國人，忘掉了自己曾經多麼醉心文革的外國人，還有許多人把這歷史弄得俗耐不堪，以作為風行世界市場的商品。

以這種觀點看，中國文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原來針對的那個造成各種問題的世界，已逐漸被另一個由當代資本主義的變革力量主宰的世界所取代，不管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世界的批評者，對於出現這種情況都始料不及。文革是對抗帝國主義或抵抗第一世界宰制第三世界的革命的產物，它針對的是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但當資本主義的第一世界已在創造新的國際關係以及相應的社會和文化關係時，這些問題也就顯得無關重要了。毛澤東思想中的現代主義和反現代主義間的矛盾，在它們被道出之時已被納入後現代主義的世界概念中，這些概念自其時起便證明在包容矛盾方面有極大能力；因此，當激進派仍在為如何適當對應資本主義的過時概念爭論不休時，商界已能運用毛主義策略來制定市場計劃。

文革是抵抗第一世界宰制第三世界的革命的產物，它針對的是過去遺留下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在當今就顯得無關重要了。但資本主義又製造了急待解決的新問題。毛主義對於社會的革命性構想，可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們解決當今資本主義的問題。

不管是思想失敗也好，實踐失敗也罷，文革期間出現的毛主義的消亡，不光因為它是一種失敗的革命思想，更因為推陳出新的資本主義世界已和當初產生毛主義時大相逕庭，使毛主義日漸脫離現實。文革毛主義今非昔比，不再被視為對未來的解答，而只是過去的苟延殘喘，被現代世界超越而變得毫不相干。

文革——或者說得更準確點，文革挪用的革命毛主義——對現代有沒有啟示？我認為有。今天背棄毛主義對現代性的選擇，是整個揚棄以激進選擇替代資本主義趨勢的一部分。我們不要忘記，雖然由於資本主義的內部演變，使得早期社會主義針對其宰制地位所提出的挑戰喪失意義，但資本主義仍舊是資本主義，它的這些演變又製造了（並仍然繼續製造）急待解決的問題，其中有些自有資本主義出現以來即存在，有些是由資本主義的新生產和組織方式所造成的。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以當下作為它們的出發點，但這並非說過去對於當下沒有啟示作用，重拾早期的革命挑戰是克服資本的意識形態霸權不可或缺的。但過去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毛主義對於社會的革命性構想（前述毛主義提出的關於地方社會的根本問題），尤其可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們解決當今資本主義的問題。

近幾年世界各地的激進活動紛紛轉向，從原來強調民族國家轉而着重地方運動。激進活動轉向的原因之一，自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解決社會問題一籌莫展，叫人理想破滅，然而，這一理想破滅本身卻是資本主義和前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對國家喪失信心的其中一環。儘管民族國家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已經消亡，但在過去二十年來，各國急於擺脫以往為造福人民而肩負的責任。除此以外，國家與跨國資本主義的勾結日見露骨，國家再度毫不忌諱地充當資本利益的促進者，有時候還把它們自稱代表的民眾利益置諸不顧。各地的國家「私有化」過程程度不一，視乎民眾的抗拒能力而定，這種私有化代表一種世界大勢，衝擊着以往民族國家捍衛公域抑制私利的概念。這同樣是資本主義新階段的產物。在此意義下，社會主義國家自1980年代末期的沒落（破私立公的最極端形式），可視為世界進程（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一部分。

以往，國家在跨國資本主義勢力和地方社會需求之間，扮演着中介斡旋的

角色，而「公共國家」(public state) 衰落的其中一個副產品，就是上述功能的削弱；因此地方社群要比以往更直接地面對世界經濟的需索。換言之，近年來地方社會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不單是因為對國家或國家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失去信心所致，還因為跨國資本的運作打破了地方社會原來閉關自守的狀態，利用它們來達致目的，而當這些地方社會再無利用價值時就棄若敝屣。正是這種資本運作塑造出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地方面貌。地方社會必須自求多福，擺脫對國家的依賴，方為對應之道。這對於孕育地方運動是相當重要的。

我不是說地方運動全然專注地方事務就能成事。要有效抗衡資本的世界力量，地方運動就必須締結跨地方聯盟(不只是在國內，而是跨國界地進行)；身處世界資本主義的環境，或許任何一地(比如美國或中國)工人的福祉都要比以往更息息相關。但是，面對着新的形勢，要釜底抽薪地保障人民的福祉，就必須以地方為出發點。

我想這就是以毛主義形象呈現的中國革命記憶最能提供給當代的啟示。如前所述，文革時期的毛主義把地方和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但它是源於中國革命史上更早出現的無政府主義構想，後者把地方和國家脫鉤，並認為地方社會的首要工作是擺脫和反對民族國家。因為毛主義着重地方社會程度的「自力更生」，故包含了地方自治的理想。它的產物眾所周知。特別重要的是在地方社會層次實現工農業結合制度化，為毛澤東時代以及毛後時代的中國創造獨特的社會布局，這解釋了為何中國社會與其他早期社會主義社會不同：在向資本主義世界系統開放之時，能制衡資本主義破壞社會的力量。這種社會布局的成功實有賴於革命時代的經驗，雖然它或會製造腐敗和濫權的條件，這在今天叫人憂心忡忡，但它也培養自力更生、集體活動和地方政治領導和民眾間緊密合作等習慣<sup>②</sup>。

雖然北京當局仍握有控馭力，並迅速把中國社會圓滿發展的功勞往身上攬，但這些成就其實主要應歸功於地方社會自求多福的能力，這點耐人尋味。若把北京共產政權和中國地方社會孤立起來看固然不妥當，但作一個分析性的區別亦不無助益，我們可藉此看到中國兩個相衝突的發展範式。一個是以政府為核心，保障共產政權和它栽培的新生管理階層在國際經濟和政治中佔據要津，但它除了造就極權國家資本主義以外就無甚裨益。另一個範式則建基於地方社會之上，承接早期地方發展以人民福祉為先、國力為次，並指向民主社會主義的革命遺產。後者在政治上激進之處還在於，儘管它明顯不是排斥國家，但要求重擬國家的領土範圍(體現於新地方分權主義的主張)和勢力範圍。換言之，它提出重新思考國家的界限和責任，對抗現政權界定的國家權限並以此為其合法性的主張。

由於現政權傾向採納它的革命遺產，而捨棄其反革命極權傾向，換句話說，中國社會不但繼續提供一種挑戰資本主義霸權的現代性的不同選擇，而且亦為當代資本主義的國際關係格局製造的問題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法。也許毛主義構想的遺產在中國最顯而易見，但在世界各處的地方運動中也可見其蹤影。

跨國資本的運作打破了地方社會原來閉關自守的狀態，利用它們來達致目的，而當這些地方社會再無利用價值時就棄若敝屣。要有效抗衡資本的世界力量，地方運動就必須締結跨地方聯盟以保障人民的福祉。我想這就是以毛主義形象呈現的中國革命記憶最能提供給當代的啟示。

在第三世界地區(從印度到恰帕斯)，自力更生的主張鞏固地方社群、抵抗資本肆虐；除此以外，它在第一世界社會裏喚起人們記憶中生氣煥發的社群，與世界資本主義的「虛幻社群」(virtual community)分庭抗禮。

或許文革未必稱得上是唯一(甚至最忠實)根源於中國革命史的毛主義構想的代表，但它有聲有色地向世人展現了這種構想的力量，將縈繞往後好幾代人的記憶，這足以證明它堪稱世界歷史事件。然而，它不只是一朦朧的記憶而已。我們可能會試圖把它的記憶驅散，但它是揮之不去的，因為在歷史現實中，它回答的問題是我們遺產的一部分。不論喜歡與否，每當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時，它就與我們同在。

林立偉 譯

### 註釋

①③⑥ 參看拙著：〈從歷史角度看「文革」的政治意義〉，載《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7期(1996年春季)，頁21-48。

② 關於蘇聯文化革命的分析，見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③ 見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146 (July-August 1984): 53-92; and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5.3 (Fall 1986): 65-88. 在此，文化革命描述了中產階級現代主義文化的出現，以及其後擺脫現代主義但仍屬於中產階級生產模式範疇的後現代主義的出現。

④ Philip R.D. Corrigan and Derek Sayer: *The Great Arch: English State Formation as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⑤ Stuart Hall: "Negotiating Caribbean Identities", *New Left Review*, 209 (January-February 1995): 3-14.

⑥ 這其實是自由主義反駁保守反共主義的論據，它認為可以從地緣政治方面着手來對付共產政權，這和冷戰理論的假設相反。Robert Tucker提供了一個重要、有影響的例子，見Robert C. Tucker: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New York: Norton, 1969).

⑦ Maurice Meisner曾在著述中再三強調文革的這一特點。見"Stalinism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Arif Dirlik, 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 Thought* (Atlantic Heights, NJ: Humanities Press, forthcoming), and "The Deradic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 NY: M.E. Sharpe, 1989), pp. 341-61.

⑧ 關於毛主義如何被法國和美國共產主義運動接受和發揮了甚麼影響，詳見A. Belden Fields: *Trotskyism and Mao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raeger, 1988). 關於毛主義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響，見William Duiker (Vietnam), Orin Starn (Peru), Sanjay Seth (India), J. Victor Koschmann (Japan), and Emerita D. Distor (The Phillipines), in Arif Dirlik, 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 Thought* (Atlantic Heights, NJ: Humanities Press, forthcoming). 亦見Nick Knight未發表的論文: "Maoism Down Under: The Theory and Tactic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 (Marxist-Leninist)".

⑨ 現在農業社會已邊緣化了，今天看來這篇文章似乎很無聊，但它的意義在當時是立即被認同的。美國著名政治學家Chalmers Johnson曾反駁林彪的論點，見 *Autopsy on People's Wa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⑩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就這問題所作的辯論，見Arif Dirlik: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 Early Chinese Marxist Thought", *The China Quarterly*, 58 (April-June 1974), pp. 286-309.

⑪ 亞敏的著作中最透徹的或許是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London: ZED Books, 1990)。亞敏當然不是唯一例子。中國革命和毛主義發展政策也影響諸如華倫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跟他一起提倡「世界體系分析」(world-system analysis) 的重要思想家。毛主義發展模型所關注的問題，與現今人們對現代化理論的不滿相呼應，這主要(但不是唯一)體現在世界體系分析和拉丁美洲提出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 裏。換言之，毛主義範式是各地人民尋找取代現代化理論的選擇一部分。亞敏的自述可參Samir Amin: *Re-reading the Postwar Period: An Intellectual Itinera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4)。

⑫ 關於無政府主義者對地方社會的看法，見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Ming K. Chan and Arif Dirlik: *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 Anarchists, the Guomindang, and the National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 1927-1932*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⑬ 重要例子見Stephen Andors: *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94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ntheon, 1977); Charles Bettelheim: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Changes in Management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 Ehrenfeld tra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以及William Hinton的多部著述。Hinton對中國農業所知甚詳，或許比許多領導人猶有過之，他是少數仍然堅信毛主義發展策略的中國研究專家之一。

⑭ 有關文革與早期更合理和更有效政策背道而馳的論點，見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關於毛澤東本人想法的矛盾，見Dirlik: 〈現代主義和反現代主義——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11月15日，總第5期，頁37-49；關於毛主義在其新民主對文革構想，亦見Dirlik: 〈後社會主義？——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反思〉，李君如、張勇偉編：《海外學者論「中國道路」與毛澤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⑮ 有關今天第三世界的情況，見Arif Dirlik: "Three Worlds or One, or Many: The Reconfiguration of Global Relations Und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 *Nature, Society, Thought*, 7.1(1995), pp. 19-42.

⑯ 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fo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⑰ 見註③ Fredric Jameson;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89)。

⑱ 更深入的討論，參Roberto M. Unger and Zhiyuan Cui: "China in the Russian Mirror", *New Left Review*, 208 (November/December 1994), pp. 78-87.

德利克 (Arif Dirlik) 美國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歷史系教授，專攻中國現代史。著有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Westview Press, 1997) ;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 Thought* (ed., with 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Humanities Press, 1997)。